

杰出的爱国实业家周志俊

□方 隅



周志俊

周志俊先生(1898—1990年)是我国现代杰出的爱国实业家,是我国北方实业界一位很有影响的人物。在旧中国,他怀着“实业救国”的愿望,致力于民族工商业的发展,走过了曲折的道路;他艰苦支撑、独力经营,抵制了外国侵略势力的兼并企图,并为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贡献。新中国成立后,以他为代表的“久安资本集团”在上海首先接受社会主义改造,走上公私合营的道路。他还两次放弃价值近300万元的证券定息,全部交给国家,并多次出巨资捐助国家的各项建设、教育和福利事业,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积极贡献。在担任山东省政协和山东省人大常委会等领导职务期间,他恪尽职守勤奋工作,不顾年高体弱,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宝贵意见。他还积极参加社会活动,为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做了大量的工作,受到了人们的爱戴。

—

周志俊,名明焯,字志俊,以字行,号良轩主人,又号市隐,安徽省东至县人,1898年出生于一个封建家庭。祖父周馥为清末显宦,是晚清洋务运动的重要人物,曾协助李鸿章办理洋务达30多年,曾任津海关道,直隶按察使、布政使,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山东巡抚、两江总督等职。周馥为官期间,主张推行“新政”,学习西方,实行改革,发展资本主义,曾参与和主持了不少农业、工业和文教事业的建设,在山东各地创办学堂,发展农桑,筹办渔业、海运,派员出国学习机械制造等等。周馥兴办的各项事业,虽然是依靠当时朝廷的资金,并不是私人兴办的企业,但在当时,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顽固的封建势力,也显示了周氏家族由封建官僚向民族资产阶级转化的趋势。

父亲周学熙是周馥的第四子,幼读经书,16岁入洋,1893年(光绪十九年)参加顺天乡试中举人;嗣后被荐参加会试,因主考李鸿藻偏狭不取而被黜。自此念功名有数,不再从事科场生涯,于1896年投身北洋,奉委总办开平矿务,因该局督办张翼同洋人订立丧权辱国之让渡合同,周学熙拒不签署愤而离职,自行组织滦州煤矿公司。1903年筹办直隶工艺局,主持全省工艺建设事宜;1906年奉命收回唐山洋灰公司厂产,招股重办,扩建后定名为启新洋灰公司,自任该公司经理达二十年。1907年筹设北京自来水股份有限公司,开创我国现代自来水工业的先河。中华民国成立后,周学熙两度出任内阁财政总长,其间集资创办中国实业银行、大宛实业银行。1918年到1921年,周学熙还在唐山、天津、青岛、卫辉等地开设华新纱厂,在秦皇岛开办耀华玻璃公司,在唐山设启新机器厂。随着生产的发展,资本的积累,以启新洋灰公司和滦州煤矿公司的主要股东为支柱,逐步形成了一个以他为代表的新型资本集团——华北灰矿财团,周学熙本人也成为民国初期北方财政实业界的著名代表。

周学熙早年受“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派思想影响,主张借鉴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兴办实业。他曾于1903年去日本考察,日本明治维新之后社会经济的发展,给他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认为通商惠工,发展生产乃根本之计,明治维新之建设,可为我国师表,认为“日本之兴也,其在工商乎!”于是一生孜孜不倦,从实践中贯彻实业救国的主张。由此可以看出,周馥的协办洋务,周学熙“实业救国”的思想和实践,对周志俊一生的经历都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

二

周志俊是周学熙的次子,幼年曾随祖父和父亲寓居青岛。少年时期,曾对文学和哲学有着浓厚的兴趣,对经商服贾颇怀不屑。迁居北京后,父学熙延请爱尔兰人道尔顿为他教授英语,使他开阔了眼界,涉猎了大量中外书籍。当时,他看到祖国的贫困落后和内忧外患的困境,在父亲的影响下,逐步产生了“科学救国、实业救国”的思想,走上了发展民族工商业的曲折、坎坷的道路。

周志俊一生的事业,是以经营青岛华新纱厂(后为青岛国棉九厂)作为开端的。青岛华新纱厂曾经是华新纺织公司的一个子工厂,厂址是购自德国人开办的缫纱厂旧址。“一战”爆发后,被英人强占,几经交涉,才将其收回,建成时,已耗费七八年时间。此时,日本“内外棉纱厂”已投产,日商大康、隆兴、公大、富士、宝来、丰田、上海、同兴等八个纱厂也先后投产,对华新形成包围之势。华新纱厂就是在这种同外国资本的激烈竞争中十分艰难地发展起来的。1918年,周学熙为了与美国美兴公司洽商订购设备,选派周志俊担任他的翻译,周志俊从此开始参与华新纱厂的经营与管理。

青岛华新纱厂开始由周志俊的堂兄周叔弢任常务董事,不久周叔弢调天津,周志俊接任常务,主持厂务。从1918年到抗战前将近20年的时间里,他为了在与日商的激烈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不断创立新部门,开发新产品,如设立合股线厂、织布厂、染色印花厂以至推广植棉、设立轧花厂等,逐步形成一个从组织原料到生产成品的完整的棉纺织综合生产企业。这类企业当时在国内还是不多见的,华新纱厂在周志俊的苦心经营下,形成了一套独特的先进的生产管理方式,他们当时的一些办厂经验,对于今天仍有着十分重要的借鉴作用。

一是建立可靠的原料基地。华新为了确保原棉质量,深入产棉区,自收自运;新棉上市,棉农直接交送轧花厂,既免去棉商的中间盘剥,又保证了工厂的原料供应,还保留了优良品种,一举三得。二是开辟广阔的产品市场。在产品方面华新特别注重生产细支高质棉纱,并以多种多样的新产品竞销。以其灵活的生产方式,随着市场需求的变化而决定自己的生产方向,当时一些由于销量不大而日商不愿生产的产品,均为华新所独占。在销售方面也尽量减少中间环节,厂与用户直接见面。三是实行科学的管理制度。华新改革了旧式作坊中机匠、工头各管一方的落后的管理制

度,由工务长兼总工程师一人负责全面业务,将车间管理人员大部分换为棉业传授所的毕业生;设考工科,加强技术管理,建立各种规章制度,拟定标准工作法,制订人员定额和材料消耗定额,健全各种原始记录。四是培养得力的职工队伍。华新的技术力量,多来自周学熙当年创办的棉业传授所纺织科,工人则以培训当地工人为主。当时厂人事科在进步人士关锡斌(后参加革命)的主持下加强职工教育,增加福利设施,除兴建宿舍大楼、创办职工俱乐部、开展文体活动外,还实行了劳动保险制度。厂办的职工学校中,初级班学文化,高级班学技术,并从中选拔职员和技术人员。近代国外大企业的管理措施,在上世纪30年代的华新纱厂已初见端倪。五是依靠雄厚的金融资本。当年周学熙“华北灰矿财团”的几个金融机构的资金,对华新纱厂的改造、更新与发展,起了重大的作用;同时,周志俊还继承了周学熙当年提出的“多积累,少分配”的原则,一直强调“少分股利,多留后备”。对技术改造的费用,尽量摊入成本,不作固定资产增值;另外提高原棉进厂价格加入材料成本。这使得固定资产实际价值超过账面价值,库存材料成本也出现盈余,以备在工厂亏损时能够得到弥补,保证了生产的持续发展。由于以上几个方面的优势,使得华新纱厂有了很大的发展,到抗战前夕,华新已成为在当时设备先进、配套齐全、产品繁多的拥有44000纱锭,8000线锭,500台布机,以及全套漂染、印花、整理设备的纺织印染全能企业。至1936年,华新的房地产、机器、证券等固定资产总值达8306844元。

三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在全国抗战浪潮的影响下,周志俊将青岛华新纱厂拆迁,拆迁部分运到上海不久,上海又告沦陷。周志俊于是在租界内办起信和纱厂、信孚印染厂、信义机器厂。由于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日军进入租界,他的工厂全部停产。此时,周志俊只有避实就虚,进入上海的证券市场,想以此吸收资金,为战后的企业复兴做好准备。久安资本集团就在这时候开始形成,实际上以周志俊为首的久安集团成为启新、华新系的第二代。当时隶属于久安集团的除“三信”工厂外,还有久安信托公司(原设天津)——久安银行——茂华银行、久安实业公司、宁波和丰纱厂、久安房地产公司、利安企业公司、大沪百货公司、上海毛绒厂以及一些小型纱厂和印染厂等,共有公司十多家,资本总额合计约在6亿元以上(伪中储券),已上市的股票7种,合计资本约8000万元。

1940年,周志俊与中纺纱厂王启宇以及英商信昌洋行共同创办了英商安华贸易公司,开展运输业务,在香港注册,资金约为100万元(港币),总公司设在香港,仰光有分公司,上海有办事处。当时曾购买卡车行驶于广州与韶关及仰光与昆明之间。该公司最多时拥有卡车200台,主要运销纱布,支援大后方,为全国的抗战服务,当时曾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由于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公司在广州与韶关间的货车及商品全部丧失,仰光沦陷后,损失更加惨重。此时的周志俊并不灰心,决计为战后复兴经济、发展生产做些准备工作。当时,知识界人士大都陷于困境,周便组织一些知识界人士共同考虑战后复兴规划的设想,实现产业界与知识界的结合——成立“久联设计委员会”。委员会下设化工组、机电组、经济组等,组织一些专家完成了化工厂和电机厂的设计,成为胜利后周氏创办“三新”工厂的早期蓝图。与此同时,还请留德的戴鸣钟博士著《战后的经济建设方案》,请刘云阁先生著《战后的精神建设方案》。这些著作反映了周志俊和一些知识分子对战后发展生产、建设富强的资本主义共和国的幻想。经过十年浩劫,这些资料早已散失殆尽。

周志俊在抗日时期的爱国活动,以及他在上海企业界开始建立起的声望,开始为日伪特务组织注意,终于成为他们黑名单上的人物。1941年1月20日下午5点半,当他正由信和纱厂办公室(现虎丘路88号)走出时,即遭特务袭击。由于他抗拒绑架,遂被枪击负伤,幸未致命。在医院治疗月余后,曾携家去天津,但终因不能忘怀在上海的各项事业,时间不长,便又返沪,继续从事他的活动,真正体现了一个爱国实业家的刚正品格。

抗战胜利后,周志俊又重新萌发了再度为实现“实业救国”的愿望而努力的念头。他对原有企业做了一番整顿,积极恢复生产,并按久联设计委员会的战略规划筹备建立新厂。新安电机厂、新成电表厂、新业制酸厂就是在这个时期建立起来的。与此同时,还收回了青岛华新纱厂,周志俊继续担任华新纱厂总经理。但因回收过程的种种周折和国民党官僚在战后大发“劫收财”,使得华新纱厂在收回时受到重大损失。时隔不久,内战爆发,由于通货膨胀和洋货垄断市场,终于使周志俊的各项事业陷于不能自拔的绝境。

当解放战争中的三大战役正在进行之时,上海的实业界已是人心惶惶,纷纷作转移之计,资金不断南流。周志俊此时也曾去台湾、香港考察,准备转移部分资金,开辟新的基地。平津解放后,中国共产党对民族

资产阶级的方针、政策的消息不断传来,加上一些进步人士的动员,周志俊的思想逐步有了转变,终于在1949年初,在信和纱厂董事长颜惠庆的电召下,毅然返回上海,迎接解放,参加新中国的经济建设事业。

四

解放以后,周志俊和以他为首的久安集团也得到新生。他陆续调回资金解决企业的暂时困难,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努力改变经营方向,在企业内部实行调整。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时,久安集团不但在增加生产支援前线上做出努力,同时在捐献飞机大炮方面,也有很大贡献,集团中的较大企业如华新、信和、信孚等厂都捐献飞机一架,在同行中属于前列。

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浪潮中,久安集团也走在前面。集团中的信和纱厂为全沪第一家公私合营企业,茂华银行也很快改组为公私合营银行;此后,华新、信孚、新业、新安等厂也于1954年前陆续实现了公私合营。随着形势的发展,周志俊本人的思想也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他进一步认清了社会发展的规律,看清了祖国的前途和个人的前途,并努力掌握自己的命运。在1956年当国家对民族资产阶级实行赎买政策、规定付给定息的制度以后,他主动提出放弃领取约值人民币250万元的股金定息。还主动将40年代为家乡儿童免费就学、群众免费就医而创办的“敬慈小学”和“仁寿诊所”及基金全部上交国家。

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周志俊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参加了革命工作。他先后被选为青岛市和山东省政协副主席,省人大副主任,并曾任青岛市和山东省工商联主委。“文革”以后,还被推举为五届、六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工商联委员,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等。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周志俊不顾80岁高龄,积极参加政协和人大的历次会议,勤奋工作,提出许多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如在改造现有工业企业方面,发展农村教育事业方面,重视干部专业化方面,工矿企业与大专院校直接挂钩解决毕业生学以致用等方面,都有很多宝贵的建议,受到有关部门的重视和采纳。他还十分努力地做好爱国统一战线的工作并关心着祖国的和平统一大业,写信、写诗遥寄在台湾和海外的亲朋故旧,希望共同努力为实现祖国统一贡献力量。

1990年6月18日,周志俊因病在济南去世,终年93岁。省人大等部门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仪式,向我们的这位好朋友、好同志表示沉痛的哀悼。□